

許順富

清末「新政」所開闢的近代實業建設運動，呼喚著有新思想、新觀念、新技術，懂管理、會經營，懂法律，能競爭的新式人才群體的出現。原來那種默守書齋，皓首窮經，靠做八股，博功名的舊式科舉人才已不適應變化了的時代要求，從而促使了教育領域由科場場域向學校場域的轉型。

場域概念是法國社會學大師布迪厄（P. Bourdieu）實踐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認為以往所謂的社會空間其實是被大大小小的場域所分割了的，在這些場域背後貫徹著的是各種社會力量相互鬥爭的邏輯。它與兩個概念「資本」、「慣習」是密不可分的。資本是布迪厄對馬克思的「經濟資本」概念的延伸——在布氏那裏，資本的基本形態有三種：經濟資本、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資本既被當作場域內爭奪的目標，同時又是賴以展開爭奪的手段（比如可以進行不同類型的資本交換）。而慣習則是場域在行動者身上體現出的一種性情傾向（disposition），它一方面是為場域所形塑的，另一方面又恰使得場域不斷地生成出來。科場場域是指按科場特定價值觀與調控原則所構建出來的社會空間，是科場中各種社會位置的一種關係構型。在這種構型中，考生根據各自的位置去爭奪以科舉功名為代表的文化資本，維繫或部分改變著科場空間的界限。中國「自有宋以來，科場就已被構型為社會支配關係從中被再生產出來的一個關鍵性的場域，而使科場上的考生對這種關係認同的動力機制恰可稱之為「士紳慣習」，考生所爭奪的也不再僅僅是特定的科名及與之相連的官職本身，而是布迪厄所說的『文化資本』」。<sup>1</sup>學校是「在發達的民族國家中為社會等級制提供證明的極為重要的制度機制」。西方國家中，學校這個場域與西方社會支配關係無所不在的權力元場域有著特殊的親和性。當今西方是由學校及其文憑所代表的文化資本構成了整個權力場域鬥爭的主線。<sup>2</sup>

在晚清教育由科場場域向學校場域的轉型過程中，封建皇權雖想繼續操縱對文化資本的獨佔控制權。因而廢科興學都由皇帝頒發的上諭來推行，就連1902年由管學大臣張百熙起草的《學堂章程》也貫上「欽定」字樣，作為統一模式而推向全國的，清政府還對學堂學生實行「科名獎勵」制度。「學堂與科名的相連使人們從對科名的追逐自然地轉向了對學堂經歷的追逐，而科名所具有的文化資本屬性也被一起『嫁接』給了學堂。」<sup>3</sup>以確保「天子門生」慣例的繼續延伸，保障皇權對人才的控制功能。但是在科場場域向學校場域的轉型過程中，皇權對教育的控制卻呈現出逐漸弱化的趨勢。在廢科以前，科舉事務雖由禮部主掌，但由於科場場域與統治權的特殊關係，所以真正主宰科場場域的是皇帝本人——正是由他臨時來圈選各次鄉試的正副主考、各次會試的正副總裁，並由他親自主持殿試，決定三年一任，與督撫平權的各省學政人選，科場從理論上說是皇族行權的私家園地。新式學堂興起以後，其歸口的不再是禮部而是京師大學堂。廢止科舉後專門設立學部來主管學校事務；各省學政被裁

撤，改設歸督、撫節制的提學使。昔日，科層官僚對科場事務插手的餘地很小，而今學堂正式被納入了國家科層的常規管理管道，皇權的作用被大大削弱了。加之學堂學生的出路並非任官一途，而是出現了職業異趨的多向流動，這樣對皇權的依賴就日益削弱，自主的獨立意識則不斷上升，這勢必導致疏離皇權的現象出現。廢科之後，一方面，國家權力進一步分化，地方官僚的權力進一步上升（尤其是在回避制度逐漸被破壞後，地方官僚開始名副其實地地方化了）；另一方面，地方士紳在推廣新式教育等方面權勢日重。民間統治場域為地方官僚與士紳交叉作用的地方權力場域所代替了。<sup>4</sup>這樣，紳士通過改頭換面輕而易舉的成為了新文化資本的佔有者和控制者。

湖南教育制度的改革始於1902年年初。1902年4月，湖南巡撫俞廉三根據清政府「興學育才」的諭令，一面在省城長沙將求實學堂（原時務學堂）改為省城大學堂，以為全省之倡，並令各府、廳州縣設立中、小學堂和蒙養學堂；一面遴派大挑知縣胡珍率俞誥慶等二人前往日本，考察教育，學習師範，培養師資。<sup>5</sup>後經趙爾巽、端方等幾位巡撫對新式教育的大力宣導和扶持，湖南的近代教育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形成了一個官辦、公辦和民辦配合，大、中、小學銜接，普通教育和職業技術教育並舉的格局。據統計，到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全省高等小學堂128所，學生6547人，兩等小學堂94所，學生4151人，初等小學堂419所，學生11492人；到1909年（宣統元年），高等小學堂為114所，學生8740人，兩等小學堂166所，學生8509人，初等小學堂833所，學生25061人。<sup>6</sup>也就是說，到二世紀頭年即將結束時，湖南全省各級小學堂共1113所，學生43310人。從發展數字看，這無疑是教育史上的一大進步，但相對於當時湖南三百萬的學齡兒童而言，百人適齡兒童中不到1.5人入學，這又說明清末的基礎教育仍舊處在萌芽階段，很不發達。

湖南的近代教育與官方的積極宣導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但是清末湖南是一個經濟並不發達的省份，並且每年還要承擔約七萬元的對外賠款，因此不可能有過多的資金來興辦近代的新式教育，這樣興辦近代新式教育的重任就歷史性地落在了所謂社會名流、地方賢達的紳士身上了。

教育作為文化資本的創造者，一向都是紳士享有的特權，雖然也有少數貧寒子弟經過寒窗苦讀，靠自己的發奮和努力，獲取了功名，擠上了做官治政的行列，但畢竟是為數稀少，表面看來，科舉制度是極為公平的選才制度，除了「賤民」被排斥在科舉門外外，科舉對其他階層的人都給予了平等的競爭機會，但實際並不儘然。據張仲禮的統計，科舉中榜的平均年齡分別為：生員二四歲，舉人三歲，進士三五歲。這就是說，自五六歲私塾發蒙起到金榜題名時，一般需要二至三年的讀書應試生涯。要能投身在這漫長的讀書與往往長達數月、輾轉千里的赴考生活中，至少需要兩個條件：一要有錢，二要有閑。時間與財富成為得以應考的起始資本。顯然，這些資本只有那些在資本分配的既定格局中已居支配地位的家庭才有較大的能力支持其子孫年復一年地參考。對許多貧寒之家的子弟而言，縱有登進之心，卻無買路之資。正如布迪厄所說的：要想真正把握住那些形式上向所有人開放的潛在機會，你必須佔有最低程度的經濟資本。這樣教育實際上成了富貴人家獨享的專利，而紳士更是這種文化資本的受益人。隨著新式學堂的興起，舊的文化資本逐漸為新的文化資本所取代。要成為新文化資本的佔有者，紳士除辦學和接受新式教育外，沒有其他的捷徑可尋。紳士通過辦學可以樹立自己在社會上的新形象，達到控制新文化資本的目的；通過接受新式教育，實現自我的知識更新，由舊文化資本的佔有者轉化為新文化資本的佔有者，成為新時代的弄潮兒。

紳士對新文化資本的佔有是他們共同的心願，但對新文化資本的態度卻各不相同。有的紳士投身於新式教育的創辦，並不是為了誠心引進西方先進教育制度和先進的文化知識，成為新文化資本的傳播者，而是迫於形勢所逼，實現與新文化資本的擁護者爭奪文化資本的佔有陣地，採取「新瓶裝舊酒」的辦法，達到延續舊文化資本香火的目的。如王先謙、張祖同等人。有的則是穿插於新、舊文化資本之間想通過人為的改鑄，建立一種不新不舊的教育模式，實現新舊文化資本的嫁接，如俞誥慶等。有的則想仿照西方的樣式，做新文化資本的誠心傳播者，以「磨血」的革命，來培養推進社會進步的新型知識份子，如胡元倓等。

湖南紳士對晚清教育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具體而言主要有以下幾點：

1、參與湖南學務的管理活動。1906年，清政府設立學部，各省裁去學政，改設提學使司，這使教育權很大程度上落入了地方。因為提學使名義上要接受學部考查，但實已成為督撫的屬官。同年，又新設了省學務公所，它為地主紳士正式介入學務提供了合法的管道。在湖南學務公所中有紳士20名，湖南籍紳士就有13名，擔任了包括議長。副議長在內的所有重要職務；<sup>7</sup>名外地紳士有的擔任一個課長，更多的僅為課員。7州縣設勸學所，州縣以下設勸學員，其職員均由當地紳士充任。同時，官方還允許紳士自行在省、府、州縣設教育會，「藉紳之力以輔官力之不足」，原由皇權專控的教育一下成了「官紳並用，不得妄分畛域」之場域。正如《東方雜誌》所言，湖南地區「士紳之辦學者，銳意猛進，振奮無前」。<sup>8</sup>

2、紳士興辦學堂蔚然成風。由於新政一開始就明言廢科舉是遲早之事，所以儘管舊文化資本在1905年前並未喪失合法性，但在競爭中已落下風。稍有見識的人已可預感到，學堂將成為主要的進身之階。因此，紳士利用既有的文化優勢成為學堂師資的最主要來源：有些經過了留學的「熱加工」，有些則以上層紳士的身份搖身而變為學堂監督。1902年，湖南派出第一批共12人赴日短期遊學者，其中有舉人3人、拔貢1人、監生2人、廩生3人、附生3人。<sup>9</sup>他們後來成為湖南各新學堂的主要負責人，如舉人俞誥慶先後成為官辦省高等學堂和半日學堂的總理、監督，拔貢胡元倓成為私立明德學堂的創辦人。但「熱加工」的數量遠不能滿足學堂師資的亟缺情況，於是，所謂望重或所謂趨新的紳士便成了主要的人選。屬於前者的情況有：翰林張鶴齡被聘為省學務處總辦兼遊學預備科監督，巨紳王先謙由嶽麓山長而一躍為省師範館館長。屬於後者的情況有：師範分路辦學後曾分任中路與南路師範學堂監督的戴展誠、曾熙都是公車上書的參與者，原時務學堂的總理熊希齡則擔任西路師範學堂的紳董。<sup>10</sup>在賀躍夫發現的一份1908年統計的湖北學堂3121名教職員身份表中，具進士身份的占2.24%，舉人9.68%，拔貢13.1%，生員40.6%，監生7.3%，有官職銜者9.2%。這就是說，在1905年廢除科舉後只有17.84%的學堂的教員完全沒有科場或官場背景，那麼在學堂初興之年紳士在教員中所占的比例應當較此高得多。雖說賀躍夫所統計的物件並非湖南，但湖北與湖南相鄰而居，同為教育改革之先導張之洞的統治範圍，該資料對湖南的參照意義還是很大的。周錫瑞認為，在湖南，有一個城市紳士的小團體，這個小團體的絕大多數人雖然不籍隸長沙，卻是寓居長沙的，積極從事特殊的、經常是私立的教育事業。我想這一點就足以說明，為甚麼湖南出現了為數可觀的技術學校和師範學校。就是這麼一批人，發起主辦了女子教育。這是湖南第一個猶豫不決的嘗試之著，也是頑固派肆行攻擊的特殊目標。<sup>11</sup>

1906年，《申報》曾經對湖南省城長沙的學堂做過調查，雖然這一調查不一定全面，而且也

未列出創辦人和主管者的身份，但是我們盡可能地參照人物傳記資料和人名辭典，仍可約略看出各學堂的主要創辦人屬於那一群體。

表一 1906年湖南省城各學堂調查表

儘管表中還有些創辦者的身份限於資料，難以查明，但是學堂主要負責人以紳士和經過留學「熱加工」的紳士為主體，這應該是沒有甚麼疑問的。因為能夠充當學堂創辦人和監督的一般都要有一定資歷和比較深遠的文化積累，而這一點只有擁有傳統文化優勢的紳士才能做到，而首先獲得「熱加工」的也都是舉貢生員，而沒有紳士頭銜的新型知識份子畢竟為數稀少，而且在新、舊文化資本轉型時期也很難得到社會承認，故而他們不可能佔據清末教育界的主體。

3、紳士成了清末接受新教育的主體和先驅。清末廢科興學斷絕了傳統紳士的晉升之路。清末全國大約有一百多萬紳士，這麼多的紳士在廢除科舉之後，如果不給予他們以新的出路，就勢必影響社會的安定，因為他們是有知識、享有特權的群體，沒有他們的支援，清政府的統治就難以鞏固。因而，清政府在廢除科舉前後，首先考慮的就是讓這群具有傳統功名的紳士如何在社會轉型中能繼續保持他們的傳統利益，給予他們以新的出路，以安慰他們在廢除科舉後的失落心態，使他們不至成為社會改革的反對派。為此，清政府首先給予了具有傳統功名的紳士以優先留學和進入新式學堂的特權，使他們通過知識更新，獲得重新就業的機會，走出與科場別樣的一條路來。此外，清政府還通過對新式學堂學生實行「科名獎勵制」的辦法，以滿足他們的懷舊之情，激發他們從對科名的追逐向對學堂經歷方向轉移的熱情，實現新、舊文化資本的平衡交替。在清政府所辦的各類高級學堂裏，其招生對象大多明文規定為生員以上或具中學根底者。如京師大學堂師範館，1902年至1906年共有師範生512人，其中422人有傳統功名（舉人1人，貢生48人，生員232人，監生84人）占82%，其中湖南師範生29人，舉人1人，貢生7人，監生7人，廩生3人，增生1人，附生7人，有官職者2人，其他類僅1人。<sup>12</sup>應星曾對湖南清末民初受過新式教育的73人作過一個出身分析，結果發現：出身官宦的25人（含高官出身12人），出身士人的26人，出身富家與商人的10人，出身農民與貧家的12人。文武官員、士紳富商的子弟在其中占了達83.6%之多。<sup>13</sup>最初能夠取得官費留學資格的也基本上是舉貢生員。這說明，清政府最先關心的仍是擁有傳統功名的封建紳士的出路，而不是整個社會的大眾化教育。正如前面所言，要能進入科場，首先就得有一定的經濟條件和閒暇時間，平民進入科場的主要障礙就是經濟資本的匱缺。那麼學堂的設立，是否解決了這一問題呢？從實際而言，學堂不僅沒有解決平民子弟入學的經費困難，而且甚至還加重了經濟負擔，由於多數傳統教育機構（如書院、義學和私塾）或是免費或收費極低，而以四書五經為經典、死記硬背為訣竅的傳統教育也無需多少書本筆墨等費用，所以，進科場的基本



費用是週期性的趕考費用。加之科舉考試關係著一鄉一族的榮譽，關係著家族的興衰榮辱，因而一些聰明的貧寒子弟還可能得到同族富家大戶的資助，以便他們能在金榜題名，獲得官職後，給予整個家族以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庇護，這樣，應考就成了家族之間的集體行為。而進學堂同樣要有金錢和時間，只不過學堂遠在城裏甚至國外，學生的路費宿費比以往的赴考費用要高得多；又由於學堂教學多為全日制，對學生時間的要求之多也遠非科舉時代可比。更大的變化是學堂要求交學費。《癸卯學制》中明確指出：「除初等小學堂及優級初級師範學堂均不收學費外，此外各項學堂（均需）令學生貼補學費。」另外，學生所需的書本筆墨等費用也較前增加了許多。加之學生畢業後大多留在了城市，其出路不再是任官一途，因而對家族和鄉鄰的庇護就日漸減弱，他們讀書也就不再成為整個鄉、族的集體行為，而成了一家一戶的個體行為，這樣得到鄉、族資助的可能性大大減少。由此可見，平民子弟接受新式教育的可能性並沒增大，反而還有削弱的趨勢。「雖然1905年後學堂經歷是一種新的文化資本，但把持這種文化資本的仍主要是原來的官紳富商之家。在學堂提供給平民寒士的上升機會在總量上相對下降的情況下，敢孤注一擲地去抓住那點滴機會的較多是已沒落的富家。新文化資本並未成為原來的被支配階級用以改變自己命運的有力武器。」<sup>14</sup>我們可根據張仲禮與張朋圓的統計就湖南的學堂師生數與以往的紳士數作一比較。1903-1909年，湖南學生合計有60328人，而姑且以湖南1910年的2058萬來估算頭一年的人口數為2000萬，則學生在全省人口中的比例數為0.32%。自太平天國後，湖南的正、異途紳士（生員以上）數穩定在91899人，而以1895年的湖南人口數2100萬為基線，則紳士在全省人口中的比例數為0.44%。這說明作為紳士的替代---學堂學生（其老師也多是從學生生涯中走過來的）在人口中的相對比例不是增加了而是下降了。從全國來說，在新式教育發展最快的1909年，學生在全國人口（約4億人）中的比例也不過才為0.41%。這個比例不僅遠遠不能與日本同期的比例（12.65%）相比，而且比之太平天國之後紳士階層在全國人口中的比例（1.9%）也是大大減少了。這也足以說明，進新學堂仍是官紳富商子弟的特權，而擁有傳統文化優勢的下層紳士更是近水樓台先得月，成了新教育的最先受益者，他們通過知識更新，成了過渡社會中新的社會支配力量。

### 三

新式學堂在地方的推廣過程也是紳士文化教育功能從傳統向近代轉型的過程。但由於紳士個體之間知識結構與思想狀況之間的差異以及地域、城鄉差異等因素，在清末成為新式學堂推廣者的紳士自身近代文化轉型的程度也呈現很大的差異，使清末的新式學堂也帶有過渡時期的痕跡。四川《廣益叢報》刊登的《論今日辦學士紳》一文，就明確指出了當時辦學紳士的四大弊端：一曰輕躁。「今之辦學者，大率輕舉妄動，此則請提廟產，彼則擬抽雜捐，紛紛糾擾，竭澤而漁。」把辦學變成了搜刮錢財的手段。一曰虛飾。「今日之學堂，大多注重體操一科，並輔之於軍樂，但使排隊外出時，革履囊囊，銅號鳴鳴，腳步整齊，音節皆合，以為盡教育之能事」，「最可異者，報提學使學生名冊，張王趙李，任意填寫，甚至如舊日綠營積習，有其名而無其實，種種怪像，層見疊出，竟不圖於學界中得之。」一曰好勝。「甲校之生，乙校設計以招之，乙校之生，丙校又甘言以誘之。互相猜嫉，即互相誹謗，卒至互相傾軋，張自己之手段，抵他人之暇隙，而教科之合格與否不計也。教員之稱職與否不問也。」一曰專擅。「聚二三私人，運籌密室，其款拔某校，某事屬某人，朝議夕布，悍然行之而不顧，即同為一方面辦事之人，苟有幾微之不合，必陰相排斥，務削奪其權而後已，故僅僅三四學堂之彈丸地，而黨派紛歧，不可究詰，今日演說同胞，明日凌轢同類，肩樂育人

才之巨責，而深閉固拒，予智自雄，將合群團體之謂何矣。」像這幾種弊端在清末學堂初興時在各省中都普遍存在，這勢必影響清末學堂的正常發展。

湖南學堂辦得好的在清末也大有存在，但有其名而無其實的也複不少。被毛澤東稱道的「時務雖倒，而明德方興」的長沙明德中學就是當時最負盛名的私立學校。明德學堂是1903年由胡元倓和龍璋所創，是長沙創辦最早的一所近代中學，也是湖南省第一家私立中學。胡元倓（1872-1940年），字子靖，號耐庵，晚年自號樂誠老人。湖南湘潭人，1897年的貢生，1902年被派往日本入東京弘文學院速成班學習。1903年，他自日本回到長沙，在其表兄舉人出身的龍璋和龍紱瑞的幫助下，創辦了明德學堂，推龍璋的叔父、在籍刑部右侍郎龍湛霖為總理，延聘周震麟、張繼、王正廷、蘇曼殊、黃興等人為教員，使明德學堂成為了當時新思想的搖籃。因此，它屢次遭到守舊官紳的誣陷而瀕於危境，於是胡元倓又與龍璋等商量，於西園龍宅另立經正學堂，推進士出身的譚延闓為主辦人。一旦明德被查封，即以正式取代。此後，胡擔任明德校長達38年之久，直到1940年逝世。為辦好明德學堂，胡元倓幾年風塵僕僕，奔走南北以籌措經費，為求得同鄉上海道台袁樹勳捐款一萬元，他不惜向袁樹勳下跪，為解學校燃眉之急，他忍饑餓，下南洋募捐，並借生病動手術為名，要求友人借錢相助，甚至在教育部門前絕食，要求教育總長范源濂救助明德學堂。因之時人稱其為「胡九叫化」（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九），上海《新民晚報》特地為他編了一首打油詩，寫道：「四海揚名胡叫化，辦學天天打背弓，屈膝求師兼募款，南方武訓樂誠翁。」<sup>16</sup>胡元倓先後為明德籌款達10余萬之巨，建造了20餘棟校舍，添置了大量圖書資料和儀器設備，使明德學堂的圖書和儀器設備為全國中學之冠，而他自己卻過著極為清貧的生活。他以「堅苦真誠」的校訓，開明相容，思想自由的校風，培養出了一大批傑出的優秀人才：如歐陽予倩、蔣廷黻、胡庶華、劉永濟、金岳霖、陳翰笙、周谷城、胡毅、向達、陶菊隱、劉佛年、田奇雋、李薰、劉禹暘、張伯毅、蕭紀美、丁夏畦、唐稚松、艾國祥等都是明德畢業生中的傑出人才。還有國民黨元老陳果夫畢業於明德第四班，還任過明德董事長。從明德創立以來，它已經培養了八位元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三位元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1917年，當時的教育部曾稱讚：「明德規模宏大，成材眾多，在中國私立學校中實為有數之學校。」社會上也有「北有南開，南有明德」的說法，足見明德學堂影響之大。<sup>17</sup>但也有些紳士在擔任新式學堂的主要領導後，仍舊採用「新瓶裝舊酒」的方法，繼續維持舊的教學模式。如保守紳士王先謙被任命為「專為造就全省中小學堂教習之製造廠」的師範館的館長後，舊式書院的教學內容與方式仍可在新的師範學堂的形式下繼續維持。甚至還出現了湘紳聯合奏請設立岳麓景賢堂等怪現象，借「保存國粹」，「以彰存古之義」，景仰湖南先賢之名，行恢復舊有書院之實。實際上是與原湖南巡撫趙爾巽改岳麓書院為高等學堂唱對台戲，目的在於恢復舊的岳麓書院體制，並且將招生人數擴大到三百人，遠遠超過高等學堂的招生人數，規定只招中年以上成材，「意在參用通儒，酌遵新章，將來卒業後，亦可備師範之選」。<sup>18</sup>像這種按舊書院模式培養出來的師資又怎麼能夠適應新式學堂的需要呢，這說明傳統的勢力仍有很大的市場。參與這次上奏的湘紳有二四人之多，既有舊派紳士孔憲教、張祖同、黃自元等人，也有新派紳士譚延闓列名其內，可以說這是新舊紳士的大合奏，也是對新的教育體制的大倒退。更為可笑的是，還出現了恢復科舉的建議，湖南中書黃連藩要求都察院代奏清廷恢復科舉，內稱：「自古以來拔取人才以科舉得人為最盛，現在科舉一停，天下士人失望日久，恐生亂端，懇請按照專門各項科舉令該生自任各科，分門考試，而仍以經義為主，援照科場定章錄取後，給予進士、舉人等項出身，以其廣收實學，而開士人取進之路。」<sup>19</sup>這說明傳統的習慣勢力仍在阻礙新式學堂的健康發展。而被譽為清末湖南三大儒之一的王闓運也以昌明經術，力拒邪說，著述宏富，「崇儒之雅化」於1908年獲得了清政府賞給「檢討」的職

銜。<sup>20</sup>也說明了這一時期，清政府辦學的目的仍是為封建專制統治服務，使學堂難以健康地與世界各國接軌。學堂之腐敗也不可盡言，正如時人所言：「一校之成，房屋、器具、飯食、僕隸、儀器、書籍，其種種開銷，既極繁多，且強半之事物為內地人所不習知，遂得任意報銷，恣其中飽，以經理學堂而起家者，已屢見其人，大率一校之中，總理、教習、司事等員，或以為娛老之方，或以為威福之地，或以為殖產之計，各行其是，而教育一端，則全置諸度外，故我國之學堂，養老院也，棲流所也，龐雜廢弛，不可言狀，開之七、八年，徒見經理者，營家宅、置田產；執事者，妻妾肥澤，衣食溫飽，而教成之學生，則杳然不知其何在。」<sup>21</sup>這勢必阻礙學堂的正常發展。

總之，清末湖南紳士大量參與地方學務，投身新式學堂的創辦和進行自我知識的更新，一方面推動了學堂在地方的推廣和普及；另一方面也對清末教育近代化的進程產生了負面影響。由於他們自身向近代教育的轉型剛剛起步，知識的更新遠未完成，加上士大夫傳統積習的沿襲，觀念的落後，思想的保守，管理模式的呆板，影響了清末學堂的教學品質和水準。清末學制參照和取法於日本學制，但各級學堂的實際教學水準比日本同等學校的水準要低一個等級。學堂的腐敗與教學品質的低下，難以滿足青年學生的求知欲望，促使了學生反體制衝動的出現。學堂之設按其「中體西用」、「保教益智」之旨本是想通過課堂正統文化的傳輸，培養「應時救急之才」，但對於無衣食之憂、父母之管、家室之累，卻有青春之激蕩，眼界之開放，同道之砥礪的學生來說，通過學堂這個基地孕生的卻是反體制衝動。據桑兵統計，1905-1911年間，全國各地學堂爆發的見諸報端的學潮就有339起，其中又以集體罷課為主，共有171起，退學為次，共83起。在可查知起因的271起學潮中，220起是起因於對學堂內部的不滿，40次起因於對社會鬥爭的直接介入，另有11起是為了反洋教習和教會。<sup>22</sup>

湖南自禹之謨領導的學生公葬愛國烈士陳天華、姚宏業於嶽麓山的事件起，學生鬧學風潮也接連不斷。有反對官府和學務處遷葬陳、姚風潮，有痛懲阻礙學運的長善學務處總監俞誥慶事件，有高等學堂因辭退學生代表而引發的驅逐學紳陳慶年的罷課活動以及湘鄉學界與官府衝突事件等。<sup>23</sup>這是清政府和辦學紳士所始料不及的。這說明晚清的教育已帶來了學生自我意識的覺醒，增強了團體的凝聚力。正如曼海姆在分析西方現代知識份子時所指出的「是教育使他們跨越了出身、地位、職業與財富差別，將所有受過教育的人聯結在這個基礎上。」

#### 註釋

- 1 應星《社會支配關係與科場場域的變遷》，楊念群主編《空間 記憶 社會轉型》，第21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
- 2、3、4、13、14 參見楊念群主編《空間 記憶 社會轉型》，第212、245、243、251、256頁。
- 5 《奏改設學堂及派人出洋遊學情形折》（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六日）《俞廉三遺集》卷九五。
- 6 張朋園著《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 湖南省》，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173頁。
- 7 《學部官報》1907年12月25日，第43期。
- 8 《湖南巡撫陸奏籌辦湘省學堂情形折》《東方雜誌》第2卷，第1號。
- 9 《湖南官報》1902年1-19號第35頁。



- 10 《湖南文史資料選輯（22）》第73-92頁。
- 11 周錫瑞著《改良與革命》，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50頁。
- 12 據房兆楹編《清末民初洋學生名錄初輯》第78-136頁統計，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年版。
- 15 《廣益叢報》第五年，第八期（原第一百三 六號，光緒三 三年四月三 日，1908年6月10日）重慶廣益書局印刷部印行。
- 16 明德中學校友會《胡元倓先生傳略》，《明德春秋》第8頁。
- 17 彭平一、陳先樞、梁小進著《湘城教育紀勝》第119頁，湖南文藝出版社1997年2月第1版。
- 18 《前署湖南巡撫陸奏湘紳建立岳麓景賢堂片》，《東方雜誌》，光緒三 一年四月二 五日。
- 19 《申報》1907年9月7日。
- 20 岑春煊《前湖南巡撫岑奏在籍湘潭縣紳士王闓遠湛深經術淹貫禮文請特予褒獎折》，《船山學報》第 三期文苑文錄，湖南船山學社民國二 六年丁醜歲三月立夏日出版。
- 21 《論學堂之腐敗》，《東方雜誌》光緒三 年（1904年）九月二 五日。
- 22 桑兵 《學生與近代中國》，學林出版社1995年版。
- 23 參見《申報》1906年6月29日、6月30日、7月8日、7月17日、7月18日。

許順富 1963年1月生，湖南辰溪人，湖南省委黨校、湖南行政學院黨史教研部 教授、歷史學博士。長期從事中國近現代社會史和中國現代化進程研究。

---

《二 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 一世紀》網絡版第五 三期 2006年8月31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 一世紀》網絡版第五 三期（2006年8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